

中国诗歌史论丛书

史论

中国近代诗歌

□主编 / 张松如



中国诗歌史论丛书

I207.209/50

李继凯·史志谨 / 著

中国近代诗歌史论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585825

SB064/03

吉林教育出版社

(吉)新登字02号

中国诗歌史论丛书

主 编：张松如

副主编：喻朝刚 姜念东

郭 杰

中国诗歌史论丛书

中国近代诗歌史论

李继凯 史志谨 著

责任编辑：张兴彦

封面设计：曲 刚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6插页 280 000字

发行：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册 定价：28.00元

印刷：长春新华印刷厂 ISBN 7-5383-2649-9/I·65

总 序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约略可以分作四大时期、十个阶段：

所谓先秦，是它的萌生与成熟时期。经历了绵亘数千年的原始诗歌，只可称作前艺术；文明之幕拉开，约当夏商两代逾千年，诗歌仍处于萌生状态。直到殷周之际，以迄战国末期，才开拓出《诗经》与《楚辞》两条文化史路，成熟为真正的诗歌。抵春秋战国早期封建社会的转型期，基本上形成了以华语为载体的华夏文化，涌现出儒、道、屈骚不同流派的诗歌美学思想。这样便奠定了中国诗歌流变史的光辉起点。

随后即开始了古典诗歌的拓展与发展时期。历秦汉而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书同文，车同轨，器械一量，远迩同度”，奠定了形成汉民族的物质基础与精神素质。辞赋、乐府诗、以五言为主的文人诗，都相当发达。认识水平，表达能力，都显著提高，起了综合前贤、诱发后学的关键作用。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前提下，溶合黄老与屈骚而形成儒学诗教，这是中国诗歌古典主义的最早形态。降及东汉后期，兵连祸结，灾荒并臻，人民颠沛流离，正统气运已竭，由盛而衰，以至魏晋南北朝。在战乱分裂局面下，冲破一尊思想桎梏，而门阀士流清谈风起，人的觉醒，呼唤着文学的自觉，迎来了第一次诗的高潮。由慷慨多气，而庄玄禅机，言志缘情，北质南妍，渐尚华美，以至声病之学，骈骊之说，应运而生，遂为严格的诗律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民族融合，新质活力，又为诗运高涨奠定始基。迨关陇健儿，金戈铁马，一统南北，所开创的隋唐五代格局，才把古典诗歌推上极峰，迎来了第二次诗

的高潮。时当中国封建社会如日中天，瞬向下晌过渡。文物昌盛，气象万千，昂扬的精神面貌，映衬出泱泱大国之风。风润雨膏，云蒸霞蔚，儒道屈禅，各呈异采，复相渗透，体现于诗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究，遂集承前之大成，又立启后的规范。降至两宋，风运犹存，略当午未，日暄方炽，实是自中唐而后庶族地主文士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论者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盖亦艺术趋新规律的合理体现，如合诗境与词境观之，无宁说是更胜一筹。从而迎来了第三次诗的高潮。更尤其在诗歌理论造诣上，经过程朱理学的生发，无论表现的多么曲折，在吸收了庄屈、特别是禅学之后的儒家哲学和华夏美学已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从而境界、韵味、妙悟、意象诸说便日益成为诗歌美学的重要范畴和主要特色。严羽《沧浪诗话》实是唐宋而后综论诗学的标准典籍，至此已成为中国诗歌古典主义的终结。

再后则是诗歌流变的分化与深化时期，历经辽金元，而明，而清，进入封建社会的后期。由诗的前进运动和基本风貌上来看，已从古典主义分化出来，并在不断深化中朝着近代目标演化。古典主义，百足之虫，虽死而不僵；但就主体言之，则适应着元明以降商业空前繁盛，城市消费日益发达，市民阶层逐步兴起，以大都为中心的古白话形成并成为书面语言，一种新的社会潮流在悄然运行，直接反映在阳明心学的解体过程，并闪烁折射到艺术美学领域：“爱”、“欲”、“性”、“情”、“心”、“私”、“我”……，都被积极肯定，公然倡导，强调个人感性存在，重视男女情欲问题，明确表达了自然人性论的近代倾向，从而于诗歌上则表现为贵“本色”，崇“性情”，尚“童心”，扬“性灵”，鼓吹“自我立法”，“师心不师古”；文艺潮流五花八门，或倡言平易（公安派），或追求艰涩（竟陵派），却共同呈现出

对传统诗教的脱离与背弃；在技巧上，公然提倡“趣”、“险”、“巧”、“怪”、“浅”、“俗”、“艳”、“谑”、“骇”、“疵”、“出其不意”、“冷水浇头”等等，一反“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古训；在形式上，体裁多样化益形显著，除传统的诗词歌赋外，更风行散曲、小令、套数、诸宫调、鼓书、弹词、山歌、小调，以至杂剧、传奇诸种歌诗与剧诗。正是在这些方面，决无夸张地说，形成为第四次诗的高潮。这就是说，在中国诗歌流变的长河中，出现了一个历史性转折，亦即从古典谐和走向近代崇高的开端。虽然这个开端仅仅成为一朵未得结出硕果的浪花。它为入主中原的满清的保守文化政策所梗阻，正如元明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为满清“雄才大略”的铁蹄所踏践一样，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实际上并未得从这里起步，没有能够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并驾齐驱，徒令千古扼腕！乾嘉盛世百余年间，文艺与诗歌在理论认识上虽有进一步概括加深的表现，而在创作实践上则向感伤主义倾斜，一直并未绝迹的古典主义大有再度抬头的趋势。

而最后近代化以至现代化进程终于到来，这在诗歌的流变史上便是综合与融合的时期了。中国的走向近代化是外铄的，沉沉酣睡中的天朝迷梦是由帝国主义的鸦片和炮舰打破的。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而近代诗歌则正是在这种剧烈变化的现实基础上产生的。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如火如荼，日益尖锐化、表面化的情形下，配合着进步力量的斗争，首先发生了内容的变化，然后又逐渐发生了形式以至风格的变化，这是近代诗歌的主流：是服

务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诗歌，或者说是作为反帝反封建斗争实践之反映的诗歌，是封建末日的预感所蕴含的理性批判精神，在发展着的现实条件下，被新的战斗烽火所点燃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诗歌。这种形势实处于古代与近代、中国与外国各种文化观念与美学思潮激烈冲撞的交汇点上，因而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诗学与诗作，都要求着由综合到融合，以融合超综合的发展。而衡之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由许多民族和地域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文学”，我们的近代诗歌实际上还未能突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而它并没有成为现代诗歌的开端，而仍应属于古典诗歌的结尾，没有超越前资本主义性质范畴。当然它已经为“五四”新诗歌运动奠定了一定的历史基础，这也是必须估计到的。而这，却又无可置疑地显示出：未能完成社会近代化历史任务的资产阶级，当然更无力完成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中国的历史道路，从经济、政治到文化，就其总体来看，必须也只有经由新民主主义而抵于社会主义，这已是为历史实践所证实了的。它昭示我们：开始了现代化过程的“五四”以来的新诗歌，就其主流说，理应也便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诗歌。当然这仅是从其社会属性而言，若论形式技巧、表现手法、审美要求、艺术取向，则必多样甚至多元。

总之，我们把“五四”以后的诗歌视为中国诗歌的一个独立阶段和特殊部分，称之为现代诗歌，不仅因为它在时间上属于现代，更因为它反映了中国诗歌现代化的进程，是现代意义上的诗歌：首先，它是以现代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为思想基础的，集中表现对于人的命运和人民命运、民族命运的关注，并在创作主体的个性、自我意识和描写对象社会化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加强。其次，它以改变诗歌语言为突破口，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诗的节奏韵律，实现“诗

体的大解放”，从而完成了完全独立于传统的诗词之外的崭新诗歌形式，并建立起现代诗歌的新传统。再次，在中国诗歌流变史上，它既然是“截然异质的突起的飞跃”，则自必以引进外来形式为诗体模式，不断接受外来影响并溶化在自己民族风格中，以致在语言铸造和诗艺运营上，愈来愈与外国诗歌趋同，而逐渐增加了世界性色彩。最后，它诚然完成了新传统的建立与旧传统的打破，但打破或者叫作决裂，并不意味着割断，而只能是扬弃与吸收，批判与继承，也就是推陈出新，不推陈便不能出新，而没有可推之陈，也便没有可出之新，现代诗歌总是在前代以至古代诗歌基础上，并吸收其他民族的新因素而生发创造出来的。这些便决定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诗歌，亦即中国现代新诗歌创作实践与理论建设的道路和特点，它迫切要求着古今中外的综合与融合，在现实主义精神统摄下的多种表现手法以至创作方法，将是激励前进的主要动力。把“二为”原则真正内化在心灵里，则“双百”方针自然体现于实践中。随着改革开放大潮中两个文明建设的迅猛发展，在迎接21世纪更壮阔灿烂的日出的黎明时刻，伟大时代呼唤着伟大诗歌，空前瑰丽的第五次诗的高潮，是可以预期的。

如上所述，四大时期，十个阶段：萌生与成熟（先秦）；拓展与发展（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分化与深化（辽金元、明、清）；综合与融化（近代、现代）。我们这部《中国诗歌史论》丛书，便是依照这个框架，在史的基础上立论，在论的主导下写史。史是客观存在，论述是主观认识。它不是一般的诗歌史，不是一般的诗论，也不同于诗歌批评史或诗歌美学史；它是诗歌史论，属于艺术文化史性质，即诗的文化史，从文化视角来论述中国诗歌的历程与发展，或者说中国诗歌的文化之路。

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套丛书？大凡写史都必须立足于今天，才

能通向明天；历史只有结合现实，才得显示意义；任何文化遗产，只有根植在现实思想的土壤里，才能获得生机。历史研究，决然不得止于对旧世界的解释，而必须要指向新境地的创造。前述各种类型的有关诗歌史的研讨，都莫不皆然。而最概括最灵便的则以史论的形式为更突出。这是由于如前面已曾指出的，史是客观存在，论是主观认识，自然更方便于联系实际。有的学人反对用今语说解古籍，这是违反理解原理，不合解释学规律的，也是永远办不到的。如果不是古为今用，写史读史，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套丛书，合明清为一卷，总共为九卷。分看，可视为断代；合读，则成为通编。但斯编之作，在倡议时固亦曾有一个大致轮廓的设想，而各卷纲目，俱由撰写者草拟，虽经统一审核调整，究仍显示着主体意识；又都分别撰写，虽亦经过编审统稿，而仍保留着个性风格。分别看，各卷都是撰写者的专著；合来读，当可约略窥见编者的用心。总之，这是在充分发挥了个体活力基础上，由集体合力完成的一部大型著作。这样，也或者可以使它得能保持生动性与丰富性，而又不迷失方向，且遵循着共同道路，向一个目标前进。于其缘起，《中国诗歌史论》曾于1987年被列为《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的重点科研项目。经各位同志的多年共同努力，并广泛吸收前人时贤的卓识高见，现在，这项工作已基本完成，并以丛书形式发表出来。这是令人欣慰的。

事属草创，意在探索。疏漏误谬，当所不免。希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张松如

1992年8月于吉林大学

目 录

总 序	张松如 (1)
引 言	(1)

I 存在论

第一章 近代诗歌的“多边关系”	(6)
第一节 与时代生活和文艺思潮的关系	(6)
第二节 与古典诗歌及其它文体的关系	(13)
第三节 与外国文化和现代诗歌的关系	(23)

II 阶段论

第二章 近代诗歌的艰难历程	(34)
第一节 始变期：启开封闭之门	(37)
第二节 发展期：始变后的深化	(41)
第三节 转换期：走向“过渡”的完成	(47)
第四节 近代诗歌行进的主要特点	(53)

III 本体论

第三章 近代诗歌的基本内容	(62)
第一节 主旋律：爱国主义	(63)
第二节 言新志：民主启蒙	(80)
第三节 诉衷情：自然人生	(85)
第四章 近代诗歌的艺术特征	(96)
第一节 旧瓶新酒	(96)

第二节	鹭外向俗	(106)
第三节	创造诗史	(118)
第四节	方法多样与慷慨悲凉	(127)

IV 流派论

第五章	近代诗歌的三大流派	(140)
第一节	启蒙——维新诗派	(140)
第二节	革命——南社诗派	(162)
第三节	宋诗——同光诗派	(181)
第六章	地域诸派与准型诗派	(202)
第一节	地域诸派	(202)
第二节	民众诗派	(222)
第三节	女性诗派	(236)

V 诗家论

第七章	矫矫不群的歌者（一）	(241)
第一节	龚自珍与魏源	(241)
第二节	金和与黄遵宪	(266)
第三节	康有为与梁启超	(294)
第四节	章太炎与秋瑾	(310)
第五节	柳亚子与苏曼殊	(329)
第八章	矫矫不群的歌者（二）	(351)
第一节	陈三立与王闿运	(351)
第二节	文廷式与清末四大词人	(362)
附 录	主要参考书目	(379)
后 记		(382)

引 言

近代诗歌离我们并不遥远，就似那鸦片战争的枪炮声还依稀可闻、“五四”运动的呐喊声还清晰可辨一样。就在这两种不同寻常的震聋发聩的声响之间（1840—1919年），中国人苦煎熬了80年，同时也花费了80年不断地寻觅着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了经由中国近代化而走向现代化、也同时是走向世界的伟大而又艰难的征程。^①面对着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作出了不同的努力。同一个人于不同时期也可能给出不同的答案，有时还不免自相矛盾。敏感多思的近代诗人对此也同样充满了矛盾和困惑，即使在他们面对一般社会人生问题及大自然时，他们也难得再保持象过去的古典诗人那样的心境。正是动荡不已的近代生活所引发的多向交叉、纷纭复杂的精神状态，使他们发出了不同或类似的、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的声音。由这众多的声音凝成或转化而来的近代诗（本书兼及词曲），的确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数量庞大、质量参差的诗歌遗产。

在近代，有案可稽的诗人有数千家，传世诗词有数十万首。

^① 中国近代史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这已成为我国学术界公认的定论。前苏联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三联书店1974年），上限断自1644年，满清入主中国，谓与世界近代史17世纪40年代开端相吻合。不合中国历史实情，不足取。

最新权威性选本《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共两大卷^①，精选了118家诗作3626首，词家134家的词作768首。这其实还只是近代诗歌海洋中的几座岛屿或几处港湾。作为该选集主编的钱仲联先生曾指出：近代诗歌“达到了唐宋、清初以来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在它发展后期矗起的又一座高峰。”^②对近代文学深有研究的郭延礼先生也指出：在整个近代文学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近代诗，它带着中国近代社会鲜明的时代特征、审美理想和争奇斗艳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夺目的篇章。”^③近代诗歌对“古典”诗歌的贡献的确是巨大的，然而与此同时，近代诗歌也为中国的“新诗”的诞生，作出了史无前例的、无可代替的重要贡献。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后者似乎更重要。我们看到，近代诗歌一方面以其实绩把古典诗歌推向了临近曲终的又一个高潮，同时也正在裂变出新的“诗素”，孕育着跨向新世纪的“新诗”，积累了带有先进性的诗歌遗产。自然，这遗产最直接的承继者是“五四”后的新文学，尤其是那些开拓新诗疆域的诗人们。毫无疑问，他们并非是凭空创造或单向从外国移植的。他们的成功还因为有了近代的进步诗人们用心血铺就了舟桥，用筋骨搭就了阶梯。

历史不应忘记近代诗歌，人们不应忽视近代诗歌！特别是不应忘记或忽视那种既非古典诗歌又非白话新诗的“近代诗歌”！

然而，相对于古代诗歌与“五四”后新诗的研究，近代诗歌的研究是相当冷寂的。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一部专史或史论

① 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

② 钱仲联：《近代诗坛鸟瞰》，《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

③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鸟瞰》，《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著作集中研究这段长达近大半个世纪的诗歌^①。有些人确实认为近代诗歌是那样地微不足道，非驴非马，亦新亦旧，又过老又太嫩，虽喧嚣却浅薄，……尤其是，资产阶级“爬”上历史舞台，那么软弱，那样摇摆（不是摇滚），而“伴”其存在的封建文人又是那样腐朽、反动，不是刽子手，就是卖国贼，要么就是隐士、遗老，他们的诗值得费力去探讨么？这种定型的政治化的学术观，当今看来是明显偏颇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与此不同，对研究对象从不先验地从政治上加以定性，从而进行取舍并决定是否进行深入的研究。事实上，仅仅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文化的认识和再认识，就对我们研究近代诗歌有了一些新的启发。在学术界，也有从脑中早已形成的定型的古典诗歌艺术和新诗艺术标准（或模式）去衡量近代诗歌的，于是乎对近代诗歌无形中设下了奇特的“魔床”，很难感到满意了：认为近代诗人太不争气，大失水准，对肯花气力研讨这段诗史（甚至整个文学）的人也不免有所看轻。不错，近代诗歌在它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时，也的确存在着幼稚、生涩的一面，确有弱于唐诗宋词、“五四”后新诗的地方，然而从历史发展或事物发展的规律来看，近代诗坛开始滋生新机、孕育新变的初始形态，恰恰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复杂也非常微妙的形态，这本身也是一种独特的形态，有其独特的价值。从文学史、文学社会学或发生学等不同的角度来看，都是值得系统深入地、宏观微观地、多角度多层次地去探讨的。我们真诚地认为，只要是做过父母或对人生略有体悟的人，都应知道“儿科”的重要，“幼稚”在这里不是病态而是常态；只要是做过学生的人，都应知道“老师”的重要，即使自己后来超过了老师也还要承认这一点；只

^① 据说已有同志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专著的写作，希望能早日读到它们。

要是出过远门的人，都应知道“桥梁”的重要，哪怕只是“独木桥”或“铁索桥”，也对必经此途的征程起着连通的关键性作用；只要是经受过饥饿折磨的人，都应知道每一口食物甚至是几棵“野菜”的重要，生命的延续与发展有赖于吸收每一份难得的营养……。对待近代诗歌，我们就要有这种由类似“做过父母”、“做过学生”、“出过远门”、“挨过饥饿”等人生阅历所获得的明智，怀着一种深挚的情感回溯近代，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考察彼时产生的种种诗歌现象，力求获得符合实际而又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认识和结论。

难能可贵的是，在学术界毕竟还是有一些前辈或同辈学人深谙近代诗歌的价值和重要性的，他们在资料整理和研究上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在近代诗歌研究这个相对冷寂的领域，还是有一些先生和朋友的。我们只因偶然的机遇萌生了进入这个领域一试的意念，并且在不言中得到了早在这一领域中默默耕耘的一些先生和朋友的帮助——他们的成果首先充实、帮助了我们，然后又促使我们把自己初步获得的观感与心得写了下来。这就是眼下呈现于读者面前的东西。由于我们自身水平的限制，本书的错误不当之处，肯定在所难免。我们诚恳地盼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I 存在论

“近代诗歌”是否存在？而且是否是独立的、有价值的存在？提出这种问题似乎很可笑，其实不然。因为这种问题确实存在。“近代诗歌”在有些人看来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一种模糊存在或微不足道的存在：不是将近代诗歌完全归附于古典诗歌，视其为无足轻重的尾巴，就是将近代诗歌当成现代新诗酝酿、发生时期的一种“背景”，而且是一种黯淡无光的背景，抑或是不愿正视近代文学（诗）所倾心、所归趋的指向，下意识地顾左右而言他；在大学讲坛上，很少听到讲述近代诗歌的声音，有关的书也少见，因而在文科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中，近代诗歌的知识几近于无，更遑论一般群众了；在研究界，也有不少明显持不屑一顾的态度……。总之，忽视或轻视近代诗歌（甚至整个近代文学），也就是对其存在及存在价值的一种贬抑与否定。这种现象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是值得注意并有必要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加以改变的。

在我们看来，近代诗歌不仅是一种确定不疑的存在，而且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复杂的、巨大的存在，有其特有的“中介性”存在形态和存在价值。本书即拟对此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在这里，我们首先采取静态分析或横向考察的方法，来讨论近代诗歌的“存在”问题。

第一章 近代诗歌的“多边关系”

中国近代诗歌的生成与存在，是与特定的“生态环境”紧密相关的。这个“生态环境”又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其中包括着时代生活（也包括受其影响的个人生活）、文艺思潮，古代传统诗学、诗艺的积淀与延宕，外来思潮与文化的冲击和震荡等。当近代诗歌成为一种现实的而又是精神的存在时，它不仅与时代生活、文艺思潮、古典诗歌、其它文体、外来文化等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且与现代新诗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表征着近代诗歌内在生命的延续与发展，同时通过现代新诗在“五四”以后的阔步向前，更能“反照”出近代诗歌深受古典诗歌的制约而又竭力挣脱时的万般的艰难。在这里，我们将近代诗歌与时代生活、文艺思潮、古典诗歌、其它文体、外来文化、现代新诗等方面的关系称之为它的“多边关系”，并分别地予以简要的考察和论析。

第一节 与时代生活和文艺思潮的关系

公元1840年，意料不到的鸦片战争发生了。这也体现出必然通过偶然实现，偶然又确定必然的行程。惊心动魄的枪炮声、厮杀声打破了古国固有的宁静，把庄严肃穆的北京紫禁城也拖入了紧张混乱之中。赫赫天朝上国的“中国”意识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和根本的动摇。侵略者的大炮与鸦片、铁路与洋货，席卷了华夏的大江南北。中国封建社会由此暴露出了它那惊人的